

夜光杯

我在富春庄醒来的时候,常常是天未明,窗外鸟儿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甚至都能听见它们在院子里唧唧喳喳乱飞的声音,枫叶丛中,杨梅树上,杜仲林前,它们就这么窜来窜去,毫无顾忌。

晨光大亮,出发早锻炼。我的路线一般有两,往右,进山,大奇山,步行十来分钟,前面就是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门口了,立即往左转。曲折行几百米,豁然一个溪旁水库,伫立一会儿,看碧玉般的水,看山峦倒影碧波中,这个不用说,我专门写过《寨基里的大奇》,大奇山也叫寨基山。

我重点说另一条往左的路线。出停车场,正对着巴比松米勒庄园走数百米,至庄园口,右转上坡,也是往山里

去,路左边的紫薇花、梨树、葡萄、水塘,陪伴着你一直上坡,一只大金牛正对着你,这就到金牛村地界了。转一个之字形的大弯,右边有一大片草地,路旁靠山有“遇见”两个大字竖着,草地遇见你,你遇见草地,都说得通。现在,我还不能停下,还得往里走,穿过桥洞,就是一个村,精致的屋舍,三三两两,在山上错落,看标牌,有不少民宿,这是金牛村的岩下自然村。岩下,岩没见(大奇山上应该有巨岩),各式古树倒是林立,锄头上那一棵大樟树,显然是岩下村有些年份的证明。

金牛村坐落在大奇山南麓,有童家、岩下、大塘、大元四个自然村,四百五十户人家,它的历史都写在道旁右边的长廊中。长廊上说,这个村的张姓先辈,明朝正德年间就来此居住了。不过,我相信,大奇山一带的人文历史其实更悠久,元朝诗人何骥子《咏金牛山绝句》有这样的诗句:“奇峰探古寺,披雾上云程”“人烟俯视小,禅宇仰观清。一饭同斋牛,时闻钟磬声”。云雾缭绕,古寺深藏,游人三五穿行,寺庙中,一干人正端碗举筷,忽然梵音阵阵,岩进耳中。

穿长廊,就到金牛公园。公园不大,几乎是微

等待

陆春祥

型,由一座小山包营建而成,小山脚,是几棵几百年的古樟,晨阳中,树身朝东的一面,虬枝以蓝天为背景,在空中构建出一副强大的骨骼。往山上行,有数棵松树,精干巴瘦,那些松树的枝条却夸张,似乎不受约束,肆意伸向天空。山顶有一小亭,亭边有松丝落叶,看木栏起皮的座位,坐的人应该不多,我来过数次,没有碰见过其他人。

那边的知青馆,很想去看一看,只是,我每次来都是清晨,田野里有农人在侍弄菜地,但馆不会这么早开放。我看菜地里那些挥锄耕作的身影,立刻想到知青,那时的知青,就整个桐庐围回来

说,有不少下放在相当偏远的深山里,到金牛村插队的五十多位知青,从地理位置上说应该算幸运。

折回的路上,遇见“遇见”,这片阔大的草地,必须要去打个招呼。

所谓的草,全是人工种植,草的学名叫“粉黛乱子草”,株高可达一米,花期在九至十一月,此草的花絮,会生云雾状的粉色,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的壮观景色。既然是花草,一般都有花语,粉黛乱子草的花语为“等待”。哈,看出种植者的心思了,这里要营造的,不是爱情的“遇见”,而是爱情,等你,这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花园。



贺喜 (中国画) 张锦标

50年前,我有幸成为大别山区的一名乡村女教师,在那里任教了7年。校舍由六间土坯房构成,学校仅有的4名教师承担起了方圆几里孩子们的教育重任。4名教师无法专职承担某一门学科的教学,常常是放下数学教案,又吹响了上体育课的哨子,刚刚教完一年级孩子的拼音,又给六年级学生讲解古诗词。教室土坯房的窗户就是一个大窟窿,冬天冷风嗖嗖灌进来,只能用报纸遮住三分之一,遮多了就没有光线了,因为没有电灯。一到下雨,田埂小路泥泞不堪,河水漫过独木桥,校长就带着我们到桥头把孩子们一个个牵着、抱着、背着迎来送去的。孩子们稍微长大了就得回家干农活挣工分,为此我们没少翻山越岭上门做工作。但还是有不少孩子辍学,更有不少女孩子从没进过校门。

两年后,我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任教于的学校。学校虽已易易校址,但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校舍却稳稳地矗立在崭新的校舍大门前。学校位于交通便捷的六安市405乡道旁,校园面积24.3亩。建有教学楼、综合

楼、师生食堂、师生宿舍、塑胶篮球场、塑胶运动场、绿茵足球场,场地开阔。设有音乐室、美术室、舞蹈房、体操房、图书室、书法室、电脑室、仪器室、团队活动室、科学实验室,功能齐全。学校已实现网络全覆盖,校园广播系统、安防监控系统、班级智慧畅言教学系统等,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一所乡村学校的变迁

苏纯俄

如果不是站在这通往县城的乡道旁,我根本无法分辨这与我回沪后任教的那所拥有初、高中的完全中学有什么区别。校长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他告诉我,比这些硬件设施更值得赞美的是学校的发展理念和所取得的办学成果。经过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这所乡村学校创立了“团结进取的协作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爱校如家的奉献精神”,形成了“崇德、博学、健体、尚美”的

要不是跑越野,进退维谷这个词在我心里可能只是一个成语,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不可能对进退维谷有如此切身的理解。

2018年,我参加香港100公里越野赛。CP5(第5个补给点)之后是马鞍山。我到马鞍山脚下时,天已经黑了,黑沉沉的夜空下,选手们纷纷打开了头灯。我第一次在晚上越野,戴着平时见过的矿工戴的头灯,前方的路瞬间变成一个光圈,人和光圈一起,不停地在跑动中晃着,晃向前方的一个个山谷。

马鞍山有600多米爬升,路窄,比较陡,是属于较难爬的一种。这也是香港山的特点,不一定高却比较陡。这些山路,大多用石块垒起来,不平整。我合理分配着体力,用尽可能省力的姿势,跟在后面慢慢爬着。不到一个小时,我爬上了山顶。山顶是一条徒步出来的小路。跑出去不远,一名选手焦急地问:“下一个补给点在哪里?怎么还没到?”一问才知道,他的水喝完了,急着想补水。

港百CP5到CP6的路线,是整个赛程距离最长的一段,接近14公里。刚跑完一半左右,就没水了,是够焦心的。周围的几个人听了,都有点自顾不暇的样子,没有出声。

再往前,不远处就开始下山。怎么上来怎么下去。我按照越野的要求,技术性地下山。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倒觉得下山还挺容易的。

我的老家是云南的一座县城,想必有烤串店,不过我小时候没吃过。那时最常见的是电影院门口卖麻辣煮的摊子。学校组织看《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三个小时的电影,对中学生来说过于冗长,我和同学们一次次从昏暗的放映厅溜到白昼的街上,围着大锅,等摊主捞出海带、冬瓜和其他浸透了红汤的食物,一毛一串。上世纪90年代前半的云南,一元钱的购买力并不低。

校风,培养了“敬业、爱生、求实、创新”的教风,造就了“勤学、善思、好问、力行”的学风。学校先后获得“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文明创建先进单位”“国学教育示范学校”“校本教研先进单位”“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等诸多荣誉。由于办学成效显著,近年来晋升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并与六安城区唯一一所市县级示范初中——六安九中结对共建。

看着这样一所乡村学校的变迁,我不禁感慨万千。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人才的培养是民族振兴的希望。看着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真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好时代高兴,他们不会再为了挣工分而辍学,也不会再担忧下雨了会淹没河上的独木桥,因为宽敞的乡道已经通向每个村、通向每家每户。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日子里,我亲身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深为之自豪。

不一会儿,来到了谷底,到了CP6补给点。补给点里都是人,补给、拉伸、休息。路上缺水的跑友,应该也在其中吧。片刻之后,我再次出发。前方就是港百线路上著名的针山、草山、大帽山,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难。其中,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57米。跑过大帽山,就将抵达港百的终点。

越野就是这样,不停地登上山顶,跑入山谷。假如登顶是一种阶段性的成功,山谷则又是一个成功的开始。而山谷,却往往又会让自己的心里有进退维谷的胶着。

已经后半夜了。进,是山;退,也是山。无论进退,都要爬过前面或后面的山,往前跑,会登上又一个山顶,享受又一次成功的味道。只是登顶之后,还有山谷,还有山顶。往后退,可以就地退赛,只是刚刚爬过的山,也就白爬了。

《诗经·大雅·桑柔》说: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时候,我们都会处于这样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连一代文豪郭沫若都说,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但正如俞敏洪所说,人是很奇怪的,一旦被迫人进退维谷的境地,反倒想开了,轻松了,在改变自己心态的瞬间,人生就出现了转机。此前的恶性循环被切断,良性循环开始了。在这个经验中,我明白了个真理,就是人的

人间烟火

到上海之后,吃到了新疆羊肉串。判断烧烤摊的水平,就看有没有人站在摊前举串大嚼。如果总有那么三五名食客,味道必然不错。

二十五六岁,第一次到东京出差,同事带我体验了日本烤串。用鸡作为主料的烤串,日语叫作“烧鸟”。铁道桥底下一间三

面敞开的棚屋,垂着厚厚的塑料帘挡风,旁边桌的男女有种萧瑟的老电影角色的氛围。已吃过晚饭的我尝了鸡皮、鸡胗,原来不需要香辛料,光撒盐,慢慢烤入味,一样好吃。

后来便常在上海的小酒馆吃日式烤串,有的店可选盐烤或酱烤,因为最初印象,我总是要盐烤的。近些年,烤串界呈现越来越讲究的情形,各家店主推不同品种的鸡,部位越来越刁钻,常见的如心肝胗皮胸口肉仿佛已不能满足食客,又有鸡脖肉、提灯之类。有些店去晚了就没什么可吃,让人平添惆怅。

此番来东京小住,两个月间吃了三回串,两家鸡,一家猪。也许有人会问,鸡和猪的差异太大,怎么能放在一起比较,不过在我看来,烤串算一个大类。这三家味道各有千秋,价格则有分化。便宜的“烧鸟”店和上海的小饭馆有几分相似,店主来自福冈,菜单上还有当地特色的烤猪脚。贵的那家,虽然店家说“可以单点”,墙上的菜单只有五六种鸡的部位,蔬菜干腌都没写

我的老爸张乐平不会说普通话。从小,我就听他说带有浓重的家乡浙江海盐口音的上海话。他和朋友交谈是如此,接受电台采访是如此,作报告也是如此。他常自嘲他的普通话是“叮乌国语”,或是“夜壶国语”,此两句上海话发音相同,意思是非常蹩脚的普通话。

“夜壶国语”一词出自他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开会。有一天他发烧想看医生,便在大街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可是,车夫怎么也不明白他要去哪里,而且车夫又不认识字,他连连比划着说,从“一屋医院”说到“呀窝医院”,甚至说是“夜壶医院”,车夫还是不懂。总算边上来了个识字的,老爸才知道,“原来是读:协!和!医!院!”——他加重语气一字一字地强调。

他的朋友们知道后大笑,便调侃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乐平你讲官话!”

上次还听米谷叔叔的女儿说起,那时候他们住南小街,爸爸到北京去看望米谷叔叔的妈妈,也是和车夫为地址纠缠一阵。老太太便要纠正我老爸的发音,说北京话是应该说“乃小孩”,父亲说应该是“呐小嘴”,一番海宁话和海盐话的辩论……

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我下班,刚进门就被老爸叫住。我一看,书房里几个北方记者来采访,他们竟然是借助纸笔交谈!见我回来,我便成了他们的翻译。临别,一位女士握着老爸的手说:“张老,真想不到您的三毛漫画没有文字大家都能看懂,可我们之间交流却要借助文字才能说话……”

以前没有空调,我们家中的走廊在夏天是最凉快的地方了,我们常在地上铺一张席子休息。一天我正躺着看书,老爸过来笑眯眯地说:“六七来,六七来。”见我没反应,他又说了一遍。可我还是一脸懵懂,他便大声说:“碌!起!来!”(爬起来)

我赶忙起身让路,一拍脑袋:原来刚才老爸讲的是“普!通!话!”

今年9月27日是老爸离开我们三十年整,我还是非常非常地想念他……

命运绝不是天定的,它不是在事先铺设好的轨道上运行,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命运既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总是该追求好的吧,总是有办法追求好的吧,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是一片坦途,面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山矗立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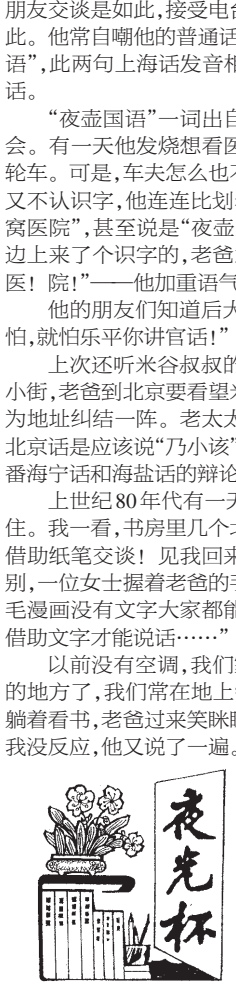
默音

上。我们是第一次上门,云里雾里,那就选套餐吧。说到套餐,烤串店与寿司店最大的区别是,吃不动了可以喊停(价格按实际吃的数量算)。抱着“来都来了”的心境,我们吃了全套,算下来一个人十六七串,半数鸡,半数芦笋等蔬菜。贵有贵的道理,C吃了从来不碰的烤鸡皮,说“很厉害”。此人吃内脏,我们一开始就和师傅说了,于是当我专心品尝肥美的烤鸡肝,C噤声旁观。在寿司店,师傅会给不吃这个那个的客人准备一份别的,烤串店看来没有替代品。

大概因为是高级店,客人与师傅很少交谈,人们在吧台边安静地吃,偶尔自己人交换几句话,整体气氛近乎肃然。与之相比,烤猪肉和猪内脏的第三家,嘈杂了不止一点点,每当有人点单,几个服务员大声唱单,吧台内负责酒水和烤串的店员跟着响应。想要和旁边的人聊天,你得扯开嗓门。这次不仅有菜单,还很丰富。我们依日坐在吧台,C观望烧烤师傅的忙碌,瞅瞅菜单,看看四周,兴高采烈。我说,为什么这么高兴。说的时候我心里有答案,这才是烤串的本质啊,满满的人间烟火。

乐平说官话

张慰军



里,有形的、无形的,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可控的前提下,翻过去,从山谷爬向山顶,翻过去,走出维谷的状态,奔向又一个希望。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自我修正中,我跑过了一个又一个越野,冲向了一个又一个终点。

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责编:刘芳